

原始社会史

——一般问题、
人类社会起源问题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著

蔡俊生 马龙闪 译

原始社会史

一般问题

人类社会起源问题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蔡俊生 马龙闪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ОРДЕН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ЕНИ Н.Н.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ИСТОРИЯ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ПРОБЛЕМЫ
АНТРОПОСОЦИОГЕНЕЗ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3.

(根据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原始社会史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著
蔡俊生 马龙闪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16.25 字数49万 印数1—16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412-5/G·45 定 价: 5.70 元

原书内容提要

本书是民族所提供的一套新丛书的第一部，其内容是阐发原始历史的一般问题和它的最早时期。这本书在总结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复拟了最古老的人类社会，并指明了这种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本书详细参考了苏联和国外出版的有关问题的资料。

编委会

Ю·В·布朗利（责任编辑）

А·И·佩尔希茨

Ю·И·谢苗诺夫

责任秘书

О·Ю·阿尔乔莫娃

译者前言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原始社会史》，共3卷，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第1卷《一般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第2卷《原始氏族公社时代》（莫斯科，1986年版）和第3卷《阶级形成时代》（莫斯科，1988年版），也将继续译出。

《原始社会史》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学术专著，由苏联科学界有关方面最优秀的专家分工写作而成，书中集中了苏联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原始时代历史的科学成就，并广泛吸取了世界各国的最新科研成果。人们知道，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苏联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它的出版自然会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而这也正是我们将它译成汉语，奉献给中国学术界的出发点。

原始社会史是近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正确的科学方法论作指导，而且需要有对其分支学科——主要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的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所达到的水准，正是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本书第一部分即《序言》、第1章和第2章就是阐述怎样实现科学方法论与实际材料的有机结合的，其中充分展示了苏联学者研究原始社会史方面的治学经验，对于我国学术界无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第二部分，即第3、4、5章论述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这是原始社会史的起始部分，也是此学科领域内空白点最多，争论最多，因而最困难的地方。虽然如此，书中还是汇集了到目前为止所能得到的尽可能详实的资料，并作了我们认为相当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这个部分我国学术界的综合性研究还比较少，基本上仍处于原始社会史的基础学科（这里主要指古人类

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内,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同样不乏新鲜的思想 and 内容。

《原始社会史》第1卷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前言》、《序言》、第1、3、4章和第5章(除一个问题外)由蔡俊生同志翻译,第2章和第5章第4节的《理性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产生》由马龙闪同志翻译。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错讹疏漏之处,望读者多多指教。

此书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多亏了浙江人民出版社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8年12月

于北京

前 言

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 H·H·米克卢霍-马克拉亚民族研究所出的《原始社会史》的第一部。这部书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史料学和学说史的一般问题，同时又考察了人和社会的形成问题。

出版这部著作的基本任务，一是总结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起来的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关于第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资料；二是联系这些资料对解决近10年来出现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贡献。不过也应当注意到，这种资料虽然并非始终是充分的，全面地要求那是无限的，但另一方面大多数问题似乎也并不限于一种解决。正因为如此，阐述难免常常带有概括性，总结和说明这种材料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仍然处于被研究的阶段。

无论我国还是国外，都出版了不少原始社会史的或者原始文化史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民族学著作援引着考古学、人类学的资料，考古学著作援引着民族学、人类学的资料，最后也可以各学科内容均等，则以上述各学科的资料为基础建立起来。在这后一种出版物中就进行着一种尝试，即综合地阐述和说明不同学科——在这里它们表现为原始历史学的亚学科——所积累起来的事实，虽然由于历史地复拟原始时代所使用资料的特殊性，这里也存在着仅仅或者主要依据一个学科（原始历史学的亚学科）的资料进行总结的那样一些部分。很明显，象这样的著作如果不依靠基础研究，不依靠苏联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所创作的一系列著作，比如象《世界民族》（Народы мира）、《旧石器时代》（Палеолит мира）、《苏联

领土上的石器时代》(Каменный век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СС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 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等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同时，如果无批判地利用资产阶级科学在这个领域里所做的一切，自然也是不适当的。

目前的这一卷——由它开始的整部著作也一样——乃是集体创作的综合性科学专著。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原始社会史是这样一种知识领域，在那里哪怕对于同一个思想理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来说，对问题只有一种答案的情况也为数不多。由于许多民族学的、考古学的和人类学的资料残缺不全、不够充分和相互矛盾，加之这些学术问题又特别复杂，专家们之间经常存在争论，并且，不仅相对地说在局部问题上，而且在制定一系列中等水平的理论问题上保持着意见分歧。《原始社会史》编辑部没有提出清除或者抹平现存分歧的要求，也没有强行收回已然通用的东西。这样做既可能使著作的内容苍白，又会曲解我们认识原始社会的知识结构的现状。编辑部走了另一条道路：敞开现有的分歧以及这些分歧所依据的事实和论据，建议尽可能充分地阐明有争议的问题，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对的。不过这样一来，不同篇章的作者们在同类问题的解释上就不可能全部一致，并且只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才能证明，哪一个探索方向，哪一种被拟定出来的答案更有成效。

本书的读者对象首先是广大范围的专家们——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史专家等。同时，也不限于科学工作者和历史学教授，高等院校相应学术领域里的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所有对人类的远古历史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阅读。

※

※

※

本卷各部分的作者如下：

序言——А·И·佩尔希茨；

第1章：第1、2、4、5、6节——А·И·佩尔希茨；第3、7节——В·А·施尼雷尔曼；第8节——А·И·佩尔希茨、В·А·施尼雷尔曼。

第2章：第1、3节——Л·Е·库贝尔；第2节——Н·Б·捷尔-阿科皮扬；第4节——А·И·佩尔希茨。

第3章——В·П·阿列克谢耶夫。

第4章——Ю·И·谢苗诺夫。

第5章——Ю·И·谢苗诺夫，同时有В·А·弗罗洛夫参加（理性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产生）。

О·Ю·阿尔乔莫娃编制了内容索引。М·Л·阿尔扎坎扬和О·Ю·阿尔乔莫娃完成了直到出版前整个筹备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研究部筹备了此书。民族研究所一般问题研究室全体，以及С·А·阿鲁秋诺夫，П·И·鲍里斯科夫斯基、В·К·加尔达诺夫、А·А·祖博夫、М·А·伊季娜、Р·Ф·伊茨、Л·С·克莱因、И·А·克雷韦列夫、Ю·К·普列特尼科夫、П·И·普奇科夫，在处理稿件方面给了很多帮助。

序 言

世界历史过程的每一个基本阶段，在它的研究者们看来——并且事实也如此——都存在着复杂程度不等、争议情况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问题。然而原始历史中存在的却是一类特殊问题。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在由各门科学组成的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and 它的正式名称，它的史料学基础和研究程序，它所考察的历史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以及这个阶段本身的历史分期，对它所研究的过程和形式的几乎大多数的解释，首先是它的那些主要结论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意义，在这门科学中都一直保持着争论。在这里很多情况是由于最远古的过去的信息资料仍然远非充分以及理解这个最远古时代的巨大的理论困难；但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知识领域的说明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的矛盾状况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本卷开始的整部著作都是用来阐述和考察原始历史问题的，这些阐述和考察自然应当各安其位。但是，有几点总括全局的说明却应当从一开始就提出来。

一

许多思想家，包括恩格斯，都把原始历史学算作最有意思的科学篇章。这要用三个实际上彼此紧密相连的理由来解释。其一是科学认识上的原因。我们还记得列宁的指示：为理解任何一一个现象，都必须知道这种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它经过了哪些阶段，以及仅仅由于什么原因它才成为现在看起来的这种样子^①。现代生活中的不少现象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或者开始形成，为了切

^①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第67页。

实弄明白这些现象，自然应当追溯它们的起源。阶级社会的一些基本制度——私有制、社会阶级、脱离人民的带强制性的政权，就属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形成起来的现象。由此又得出原始历史学的一些结论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二个理由——思想理论的、世界观方面的原因。

原始历史学的资料表明，早先被认为亘古以来就存在的阶级制度并非自古有之，阶级社会以前还有前阶级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这些资料给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提供了有利于证明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代替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理的补充证据。结果，原始历史学本身从此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互相抗衡的领域之一。

这种对抗的一些重要阶段将在学说史部分说明。这里只要指出，资产阶级民族学家们把半个多世纪的努力都用在这样一个方向，摧毁原始集体主义概念，并试图证明那些据说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天然形态，如象私有欲、社会不平等、政治压迫，都是历史发展的开端就已具备的本性。类似的企图，直至捍卫“原始资本主义”的思想，虽然没有完全保持到现在^①，但客观事实积累的不可逆反过程，使得他们甚至在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间也成为不得人心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西方民族学开始传播一种观念，认为早期的前农业公社是些社会等一的（均产的）公社，并且现在这种观念甚至还被确立在简明读本和百科知识的出版物中。

但是，这样做只不过使斗争的战略变得更复杂和更隐晦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锋芒指向了社会形态学的一般理论。无论从外在环节方面（制定单级“工业的”社会、“多级工业”社会等等），

^①实例参见，L·波斯皮修：《巴布亚人和他们的法律》，纽黑文，1964年（1977年第二版），以及他的《法学人类学：比较理论》，纽约，1971年。

还是从内在环节方面（清洗原始社会制度的概念）他们都试图动摇这个理论。在原始社会中划分出按单一顺序排列的阶段，这些阶段又具有阶级的历史形态的特征；基本历史时代向前发展的规律被偷换成对这些时代的结构进行评定的问题，而这种前进发展本身则成了“复杂性的标度”；社会阶级被看作分类意义上相同的派系，国家不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倒成了组织社会事务的需要，并与此相对应，不是作为阶级形成的结果，倒成了阶级形成的先声。举例来说吧，用什么样的“文化复杂性标度”与社会形态学理论相抗衡呢？美国最著名的民族理论家之一G·P·迈尔多克的野外文化研究就有这样几个“标度”：（1）均产社会；（2）具有奴役制的或者社会财产在自由民中按阶等划分的社会；（3）自由民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社会；（4）具有划分为两个阶级、奴役制以及派系体系的社会；（5）划分为三个或者更多阶级（或派系）而不依靠存在奴役制的社会^①。象这样的复杂性标度还导致了取消阶级性规定国家本质的问题：（1）仅仅公社范围内的整体化——没有国家的社会；（2）高于社会整体化一个级——领袖集团；（3）高于社会整体化两个级——小国家；（4）高于社会整体化三个级——划分出省和州的大国家^②。所有这些不仅在杂志和专著中，而且在简明读本和百科知识的出版物中都有记载^③。

一般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概念，特殊地对其原始历史学所作的正面进攻也没有停止。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公开参加到正

①G·P·迈尔多克、C·波罗沃茨：《文化复杂性的度量》，载《文化人类学》，1973年，12(4)。

②G·P·迈尔多克、D·R·怀特：《过渡型文化的标准》，载《文化人类学》，1969，8(4)。

③实例参见，J·P·斯普拉德利、D·W·姆克迪：《人类学：文化的展望》，纽约，1975年；《人类学百科全书》，纽约，1976年，（参见：《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化》）。

面进攻的行列，“驳斥”和“纠正”社会形态理论；另一些学者则既与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又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那些直接、间接地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影响或者借助于客观事实的分析得出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类似结论的研究家们，也往往避免（可能由于政治性质的原因）显露出自己靠近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然其数量在不断增长，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①。

尖锐的思想理论斗争把完全揭开原始社会制度发展规律的任务摆在苏联学者的面前。作为最近这个10年的特点的新信息湍流也涌向了原始历史领域。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常常是装不进以往观念里的资料积累起来；有时候，这些资料乍一看与人类社会起源、阶级起源等重要理论甚至是矛盾的。因此，就迫切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原始历史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基本过程。总的来说，在这个知识领域里发生着、解决了又重新发生着的那些问题的复杂性是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它的世界观意义也在不断增长。

现在还处于（或者不久前还处于）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不同阶段上的部落（部族）和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许多特点，都属于扎根在最遥远的过去的现象。这些现象需要分析和评价。由此，又得出原始历史学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三个理由——直接实践方面的原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我们的国家就有这样的部落和民族，特别在北部边区和远东。为了将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就需要从原始公社结构与最晚近的阶级结构相互影响方

^①参见Ю·И·阿韦尔基耶娃：《民族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西方》，载《苏联民族学》1971年第5期；以及她的《国外的民族学研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以及她的《外国民族学概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С·А·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78年。

面研究原始公社结构的形式和表现。现在，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许多部落（部族）和民族都觉醒起来，走向独立自主的生活；这个时候，研究原始公社结构问题的迫切性更没有减少。这些部落（部族）和民族的大多数在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尖锐地存在着关于部落内部团结一致和部落之间常常反目（部落本位主义）的问题，存在着民族、特别是公社的制度与传统的作用问题。

在评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改造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也有其矛盾的方面。按照西方广泛流行的相对主义观点，所有这些部落和民族的文化价值都是等量大的，而评价它们的标准又是相对的。这个由Φ·鲍斯首先提出并由M·赫斯科维茨发展了的理论^①，吸引了许多努力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并抵制清除非欧民族独特文化的正直的学者；但这个理论也打开了对社会形态学理论进行蛊惑性攻讦和有意使文化落后状态停滞下来的通路。^②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对一切民族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贡献都给予应有的评价，但并不以这种态度与承认历史进步的共同标准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必要性相对立。^③

①Φ·鲍斯：《原始人的智慧》，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62年；F·沃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纽约，1928年；M·赫斯科维茨：《人和他们的工作》，纽约，1949年；以及他的《文化人类学》，纽约，1955年。

②实例参见，R·斯戈特：《马克思和摩尔根之后》，载《当今人类学》，1976年，第17卷，第4册；S·吉拉久：《答复》，同上书。

③详见，C·H·阿尔塔诺夫斯基：《人类的历史统一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列宁格勒，教育出版社，1967年；以及他的《哲学相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思想体系》，载《科学哲学》，1963年，第6期，Ю·П·阿韦尔基耶娃：《新进化论、相对主义和种族主义》，载《种族与民族》，1971年，第1卷。

二

在现代西方科学中，首先是美国和英国，原始社会史通常被确定为史前史（Prehistory）或者史前考古（Prehistoric archaeology），并被看作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抑或一般人类学的一个部分^①。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研究家，特别是被称做所谓考古—语意学家的（археологи-Контекстуалисты）^②，就把史前考古与史前史同等看待，因为后者被解释为纯粹的考古学科；其他的研究家们则区分这两个知识领域，把前者同研究史前物质文化联系起来，把后者同综合地（虽然也主要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重拟史前历史联系起来^③。此外，在史前史的范围许多西方学者又划分出史前史或者原始史（праистория）本身和原历史（прогоистория）（同步史〈параистория〉，民族史〈этноистория〉），或者相应地划分出原始史考古和原历史考古。原始史是研究地球上一般还不存在文字的时代的人类；原历史、同步史或民族史是研究在文明的发祥地已出现文字以后那些尚无文字记载的人类^④。更详细地说明不同西方国家和科学流派中原

① F·V·沃盖特：《文化人类学史》，载《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手册》，芝加哥1973年；参见《人类学百科全书》“史前史”条。这种传统的开端，大概始于20年代的A·R·拉德克利弗—布朗（《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伦敦，1923年）。

② 《新考古学》或《宾福德集团》的拥护者们所持的是近似的观点：L·R·宾福德：《作为人类学家的考古学家》，载《古代美洲》，1962年，第28卷，第2册；《人类学的新前景》，芝加哥，1968年。

③ B·G·特里哥尔：《前史：史前史方法》，纽约，1968年；J·罗斯：《史前史引言·一种分类方法》，纽约，1972年；S·哈德赫：《史前的人们》，吉隆坡，1975年。

④ K·J·纳尔：《西亚、北非和欧洲》，载《史前史》，慕尼黑，1957年；N·奥斯泰赖奇—劳拉：《历史人类学：一个“文化人类学”观点》，载《历史人类学》，1966年，第13卷，第1、2册。

始历史的名称和释义已无必要，我们只要指出，在这里这个学科处处都这样那样地与考古学、民族学或者一般人类学相联系，而同时大多数情况下又与历史学本身鲜明地对立着。这种对立既有传统的理由，也有充分现代的理由。

“史前史”或者“史前时期（предистория）”这个术语，在19世纪前半叶由于资本主义上升以及稳定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而得到了推广。在这段时期内，被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点燃的探讨阶级社会的根源的兴趣，逐渐暗淡；与此同时，却进行了一些试图证明私有制、个体家庭、国家政权的亘古性质的最荒诞无稽的尝试。无论前一方面还是后一方面，都由于无文字记载的史前史断然脱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被简单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这种分离观念的支持者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政治、神学和文字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①虽然，19世纪后半叶进化论优秀代表们的著作和科学共产主义最早创始人的著作都把原始的以往包括进世界历史过程之中；但是，史前史和历史的尖锐对立却又在随后而来的资产阶级科学的反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这两个知识领域仍然按照先前的标志——存在还是缺乏有文字记载的史料，来划分界限^②；但是最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② R·洛伊：《口头传说和历史》，载《美国民俗学》杂志，1917年，第30卷；A·R·拉德克利夫--布朗《私有制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伦敦，1952年。

一段时期，在新实证主义科学学的强有力影响下又产生了一种新趋势。大家知道，由于新实证主义对非形式化的理论方法持怀疑主义态度和它的研究程序的绝对化倾向^①，在把历史排除于科学之外的同时，又把人类学包括在科学之中。所以，从这种观点出发，史前史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历史学则如同艺术一样属于纯主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两者原则地被区分为科学和非科学^②。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式上的史料学划分，如今似乎又将史前史和历史学互换了位置——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很好地“防范”了“粗暴事实”的干预。这种情况与前面指出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战略转向——与其说批判原始集体主义概念，不如说是批判整个的社会形态理论——仍然没有失去联系（即使不是因果关系，也是时间上的继续）。

当然，远不是所有西方研究家都持有或者保持过上述那些观点，许多研究家只不过出于传统使用着术语，许多研究家自己常常注意到史前史和历史学的传统对立的不合理^③。再说，划分出原历史、同步史或者民族史还显示出一种哪怕部分地“经历”一下尚没有跨进文明门槛的那些民族的过去的尝试，并因而表现为一种明显的进步。某些现代人类学家甚至还意识到这种进步的不足。比如Ch·哈德森就公正地指出：“当把没有文字的民族摆进‘民族史’的时候，我们也将他们排除在原本包括着他们的人类范畴之外了。”^④不过，开始改变原先的立场还谈不上重新评价。

①详细参见，B·C·什维列夫：《新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论证的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

②实例参见，G·E·登尼尔：《史前观念》，伦敦，1962年。

③参见，Ю·П·阿韦尔基耶娃：《民族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西方》。

④Ch·哈德森：《在人类学方面的历史探索》，载《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手册》，第112页。